

二龍爭珠之勢

「外西九文娛藝術發展論述」之二

猜測，二龍爭珠已經形成

2016 年底，林鄭月娥以政務司司長身份為東九龍文娛中心奠基，一般經歷過移民地的中老年人，按過去政府傳統倫理習慣的經驗，馬上明白東九龍文娛中心非比尋常，與一般上環、西灣河、牛池灣文娛中心，地位不同。如果，東九龍中心的高範格是政府高層計劃的一部分，並由身兼西九管理局主席的林鄭月娥奠基，單「龍」出海的構思應該可能已經「不再存在」，政府正要計劃實行二「龍」爭珠之勢。當大家還未好好消化事態發展，林鄭月娥又以另一身份的西九管理局主席，在北京成功簽約，還說服香港賽馬會出資三十五億為香港建設「故宮文化館」。加上，之前政府一方面出資建東九，一方面又放風說場地缺乏問題可能已經「不再存在」，西九第三期發展要再經調查清楚才會有進一步規劃。



故事大概輪廓已經可以猜測出來，清晰可見，西九管理局所獲二百多億資金在戲曲中心及 M+ 博物館等一、二期完成後應該已經用完，怎至可能出現赤字，政府再注資入西九機會不高。所以作好兩手準備，一方面引入「故宮」作為西九土地營運管理改變的轉折點，再運用政府資金做好東九，為場地已經充足做好口實，使西九資金用完的計時炸彈拆除，林鄭月娥的確了解官場運作。

不是抱怨時候，是時候思考出路

很多人抱怨一些朋友反對西九單一招標，把計劃「推倒重來」，如果不是如此，當年能借場地把香港九大表演藝術團隊與香港藝術節安插其中，香港已經像韓國首爾一樣有了自己的「文娛藝術區」，不像今天的景況。

也另有人抱怨是政府當初跟本沒有做好準備就推出計劃，沒有清楚計算觀眾來源與發展需要，之後更加沒有理會大家所講資金其實不足西九發展的問題等觀點，只找支持者保駕護航。

其實，現在不是抱怨過去的時候，反而是時候，業界好好思考「二龍爭珠」之勢，評估對我們及未來香港文化藝術發展有什麼影響，為大家作好更佳準備。



當年「以片蓋全」、「失去方向」

西九計劃推出初期，政府強調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有此文化建設需要，但民間則另有聲音期望政府提供有關觀眾發展的大數據。其實，缺乏數據下大家難作理性討論，可惜民間一直沒法獲得香港在藝術團體、節目類型、觀眾分類人數研究等的全面資料，所以討論無從。

各說各話之勢出現，當然有些是善意討論，更多是期望可以用最大聲音尋求在西九佔一「位置」，好好生存，什麼兒童劇、兒童音樂劇、兒童木偶劇、書法、文學、中國舞蹈、芭蕾舞、音樂劇、歌劇、設計、水墨通通湧現，務必不落後於人。查實資訊不足，各自為正，各為其主，也無可厚非。但，嘈音太多，代價正是，西九諮詢因此失去了方向感。

原來「美麗誤會」、「雞同鴨講」

香港也有很多有識之士，真心期望為大家理清方向，找出解決方案，一直追問政府，後來在諮詢活動中，從一位一直站在文化產業界前線，從殖民地到特區政府，一直是建制核心的立法議員流出來的一席話看到端倪，原來 1996 年官方在機場向旅客做了問卷調查，香港如有大型文化設置及節目，絕大多數外賓願意多留時間在港欣賞。建制議員理直氣壯地引用 1996 年的數字，所以可以斷言，西九與回歸前後政治無關，應該是政府就金融風暴後，純旅遊發展需要的計劃。原先西九與本土文化藝術發展「可能」完全沒有任何關係，是一個純旅遊業的項目，只是舞台業界美麗誤會。

或許，不是誤會，是部分有心人士想借機，提出文化藝術發展的建議，死馬當活馬的行

爲。

還是「南水北調」、「轉移視線」

西九是否應該是解決本土文化困局的機制呢？成爲很多人關心的問題。

在西九諮詢期間，業界提出最多的問題是本土文化藝術發展的困局，其中粵劇界提出的需求最迫切、激烈及受其他業界認可與同情，加上其背景及地位也是政府最難否定，戲曲中心成爲政府一石二鳥的英明決定，一方面可以「南水北調」，借西九解決了當時社會上對粵劇發展不前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可以拆解當時所有本土文化困局要求的進迫，因爲資源已經有了著落，世事總不能樣樣完滿，不能樣樣藝術都支持，使大家深信政府已經盡了力，大家如有問題，政府只好分薄對原有的支援，使大家的矛頭修改了方向。

可惜事與願違，西九籌建時間拉長，建築成本急升，十年間旅客來源及喜愛又急劇變化，難以預料，西九方向更顯模糊。戲曲中心加上 M+ 爲核心的第一、二期工程，的確有一點風馬牛的感覺，面向觀眾更加不清晰。加上康文署與其他單位也努力發展戲曲服務試滿足社會需要，高山劇場、油麻地戲院、新光戲院陸續改造成功，以至屯門、西灣河、荃灣等會堂對戲曲界使用場地已經有所滿足，直接、間接使戲曲界場地問題解決，西九戲曲中心 2018 年底建成後的定位將倍感困難。

或許，圍魏救趙、借力打力的政治手腕真的不適合文化藝術政策上使用。「新光」戲曲場地是否能保留，「新光」問題「新光」了，聲東擊西的小聰明還是少用爲妙。

粵劇的問題得到舒緩，但戲曲中心在變幻中添增了煩惱。

粵劇以外，其他舞台藝術的問題又如何解決呢？

四十年前的香港文化

談香港文化藝術發展，沒有可能與社會發展與價值觀脫節，必須由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發展初期作起點。

香港經歷六七暴動，政府明白單純以血汗工廠收留大量臨時南下勞動力及年輕人的對應方法，已經不合時宜，人口回歸內地的可能性已經不再存在，一個「後逃亡潮社會」已經形成，矛盾必須解決，以免對立的亂局會影響香港穩定，間接波及英國本土。

於是，七十年代破格送來帶有強烈社會福利色彩的麥理浩作港督，他著手發展公營房屋，以強迫教育政策消除童工及解決基礎教育問題，建立安全網式的福利及醫療，建設廉潔政府，並且通過直接投資及推動商界參與方式建立免費的無綫電視廣東話綜藝節目與連續劇集，鼓勵電影院建築政策使港產電影業興旺，通過娛樂轉移普羅低下層市民的焦點，

再運用電視明星消費有利政府的管治與價值觀，解決了當時的社會矛盾，開創七十年代經濟起飛，與八、九十年代粵語娛樂文化盛世。有了富饒、強大中國出現，香港問題自然解決的一方，與法治民主才能正式民心回歸的另一方，同時存在但不起衝突，互相尊重各自表述的自由社會，也因為發展香港的成果，改善生活的現實，成了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英國政府當然明白，下一個香港的最大挑戰，正是與中國政府就香港前途的談判，如何使香港生活安穩、富饒之餘，借助社會對「內地」法治、民主、生活如不改善，兩地沒辦法融合的思潮，有利管治與談判。

政府從香港自發的釣魚台運動中，深深明白香港人的愛國及統一國土的思想不能忽視，偏安本土監控內地的思潮，才是共識，拉得越強越長將對英國一方最為有利。後來，內地改革開放，成了中、英、港各方的新共識，也源於此兩股力量的共同性。

回歸的政治考慮與文化藝術發展的關係

當年香港政府明白新界地區 97 年需交回中國，加上要解決七十年代的居住問題，必須觸及新界土地，與中國政府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在所難免，於是大力發展新界土地之同時，建立地道高雅「西方化」的本土粵語文化藝術，一方面爭取談判籌碼及本地支持度，另一方面借此使草根與中產有了階級的共識通道，使兩者之間有了經濟以外文化上的階級流轉。

可惜當時粵劇與粵曲並非中產階層追求的潮流品種，中產階層並沒有興趣發展粵曲與本土走在一起，政府相信粵劇屬於草根世界，草根世界渴望一個強大中國，有了富饒中國的出現，香港問題也自然解決的一方，粵劇粵曲成了他們等待強大國家出現時的安慰劑，非政府期望支持的一方，這也是最有可能為什麼鼓吹粵語當代文化發展的政府不支持粵劇的因由，粵曲最終被粵語流行曲所取締。

更可惜粵劇界與文化界更沒有鼓吹合作融合發展的人物，仿佛五四初期京劇與話劇互相合作的情況，更沒有仿效韓國首爾鼓吹當代作品含有傳統元素，使韓國表演藝術作品看到韓國的金雨玉教授，粵劇與西方式本土粵語藝術各走極端，粵劇與本土舞台成了只要

中國強大香港就能解決，與法治民主才能正式民心回歸，兩種社會對回歸觀點與思潮的對抗。所以，近年對粵劇的支持，某程度上可能不是單純藝術課題，是社會某方對回歸觀點與思潮靠邊方位的轉移。



八十年代的香港政府如何建立香港本土文化

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市民財富與收入增加，基本生活條件得到滿足，中產階層出現，心靈滿足的需要日漸增加，出外旅遊與欣賞世界藝術的追求成了潮流，香港藝術節與香港電影節成爲當年年輕才進的時尚。

工黨背景的麥理浩港督，自然深明藝術文化建設社會與破壞和諧之間的威力，以娛樂解決了低下層的矛盾容易，中產與原英聯邦殖民的破壞力則不容忽視，對付他們的方式正是高雅本土文化娛樂的栽培，使他們充滿希望。當然，八十年代的香港政府也預料不到原來這些很西化的中產階層，廿一世紀的今天，在晚年退休時會有「返祖」的現象，走向粵曲、粵語的一端。

當時香港政府對社會的需要還是比較敏銳。於是，使用非常特別的方式，在灣仔海旁興建「藝術中心」，用寫字樓租金資助演出的方式，把所有英語表演藝術團隊收編其中，消除他們反對政府只支持相信法治民主才能正式民心回歸的一方的西方式粵語表演政策的動力。政府則全力建構西方化的本土文化，推動法治民主才能正式民心回歸的思考。後來，藝術發展局，兩個市政總署的文娛藝術政策，也源於此方向。

回歸後的文化藝術沒有找到應對

回歸後，特區政府理應知道，就算不知道，上層理應也感到來兩方回歸思潮的壓力。

強力合併，還是法治回歸，傳統藝術和諧發展還是本土藝術抗衡，西九正呈現這些矛盾現象，M+與戲曲中心的不協調，故宮文化館與小巨蛋流行音樂表演場地的取舍，應該也是此等政治思潮的後果。

更慘的是，社會上兩邊思潮的藝術文化表現，因長期放棄內容只重形色，而發展得極其蒼白，支持法治民主才能正式民心回歸的一方變成無病呻吟的情情愛愛，唯一改變可能只是情愛之間的性傾向不同及刻意低俗粗糙，與過去的愛情故事有所不同，根本與法治、民主的前景毫無關係。最有力量使社會更和諧思考的一方，「進念」與「藝術中心」又缺乏業界與觀眾論述支撐，戲劇評論界更自顧不下，根本無從總結。

而支持中國富饒、強大香港就能解決的建制一方，也顯得軟弱無力，建制中舞蹈團、中樂團、芭蕾舞團的節目，不單不能使社會體會中國文化之強大反而使大家越走越遠，就算是熱愛粵曲演唱的香港話劇團總監陳啟權先生也沒有努力拉近傳統戲曲與現代戲劇舞台，近年最接近的創作音樂劇《頂頭錘》也只是做到「一中各表」，看到「中」已經感人的地位。香港藝術節失去了觀眾的方向，淪為只能顧及自己生存與票房宣傳的每年隨緣動作，根本上不能帶領大家討論前景。

近期，民主、法治回歸一方的論述，在上下夾縫中，幾乎被民主、法治的離異力量所綁架，對立沒有被舒緩，反而被推高。

文化藝術的未來

文化藝術界是否能做到金融界別所創造的形勢，就是香港對中國未來有巨大貢獻，中國對香港發展有無限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香港資金在內地投資，尋找及重新建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兩方思潮最大公約數。

如果，一方永遠看不到內地在法治的改善，只看到其亂用權勢的現象。

如果，另一方永遠不願展示改善的成績與決心，誤信可以仗勢凌人，有權有勢就能扭轉過去四十年對自己不利、不公的情況。

如果，大家各持己見，香港文化藝術發展永遠沒有未來，西九永遠只會是一些「非驢非馬」的場地，東九永遠只會是香港文化中心的「翻版」，而非文化藝術發展的「龍頭」勝地。

文化藝術應該帶領我們找到出路與希望，不是給自己「宅」在原地的「安慰劑」。

王添強

2017年2月4日